



境界决定文风

□刘 涛

文学批评一般是批评家针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或者文学史等问题发言。文学批评一旦写成文章,就会涉及到文风问题。“风”一直是从中国政治或者文学中的重要范畴,“风”从《诗经》“国风”中出,一直到现在都是日常语言中的重要词汇,可见其重要性。文风是风之一种,风对社会的整体而言,观风而能知整个社会;文风只是对能文者而言,由文风而能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受到今天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批评的文风又只是文风之一种,于是减之又减,文学批评的文风只是针对能作文学批评者而言,由之或可以见出文学批评和文学界的情况。文学批评的文风是批评家本人的精神印记,批评家的文风大体上由批评家本人的境界决定。

在文学批评中,由于批评家和作家境界、身位不同,大概可以有四种情况:主看主,主看宾,宾看主,宾看宾。主是得道者,宾是未得道者;主是懂的人,宾是不懂的人;主是高手,宾是低手;主是在门内者,宾是在门外者;主在洞穴外,宾在洞穴内。四种情况当中,最理想的状态是主看主,譬如世尊与迦叶,这个时候语言都会显得多余,惟有拈花微笑而已,譬如庄子所谓“相忘于江湖”亦是如此。最差的情况就是宾看宾,双方说得天花乱坠,彼此夸夸其谈,但基本是一派胡言,疯人疯语,无有可取者,如此最能败坏文风。批评家或宾或主,或懂或不懂,其文风就会或好或坏、或善或恶、或具有建设性或具有破坏性。批评家或处于主位或处于宾位,若处于主位,其文风往往是良性的;若处于宾位,其文风往往是破坏性的。所谓好的批评家就是能处于主位的批

评家;所谓坏的批评家就是处于宾位而不自知者。然而即使处于宾位,倘若能学而不厌,也能自省,亦是好的批评家。只有先成为好的批评家,才会有好的批评文风。

若批评家与作家均处于主位,双方就是主看主,如此是得忘言之人而言,此时彼此可以说话亦可以不说话。此时双方都会很幸福,但这样的情况在同一个时空中一般都极为难得,所以孟子说要“尚友古人”,就是在时间中寻找知音。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主位的批评家碰到了处于主位的作家,双方都懂得,所以其文风一般是积极向上的。若批评家是主,作家是宾,那么批评家或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或者发言。若批评家比较慈悲,他说了,而且很直接地批评,那么这时文风可能显得犀利,这是以批评为教;若批评家说了,但有所顾忌,比如碍于作家的权势或其他因素,于是他不得不不讲求修辞,又批评又不批评,如此可能会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这两种情况都是批评家处于主位,不管他是看主还是看宾,在这样的情况下批评家的文风都不会太差。

若批评家处于宾位,作家处于主位,这时候是低手看高手,批评家看作家就会是管窥蠡测,只是雾里看花,一旦这个批评家不懂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旦他不知道反省,他就会将处于主位的作家看低、看小或者看扁,为了显示其高人一等,其文风必然不会好。若批评家处于宾位,作家也处于宾位,这个时候文学批评就是宾看宾,双方可能自以为说得头头是道,彼此都振振有词,但均是语言泡沫,皆无足观,因为都不懂,所以其批评文风一般也不会好。宾看主与宾看宾都是批评家处于宾位,

批评家处于宾位又不能自知,只好不懂装懂,那么其文风肯定不会好。

批评的文风就是批评家内心世界的展示,就是其境界的显示,有什么样的批评家就会有什么样的文风,有什么样的文风也就有什么样的批评家。批评家的境界是里,其文风是表,表里如一,里决定着表,表也反映着里。个人的文风就是其思想或立场的显现,所谓文如其人,文风亦如其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风,有什么样的文风就是什么样的人。庄子有言“有真人然后有真知”,要先修成真人,然后才会有真知。就批评家而言,要先努力提升自己,尽量往主位上走。走到主位,不论是看主或者看宾,因为懂得,其文风往往会是良好的、富有建设性的;若处在宾位,因为不懂得,所以尽管可以拉大旗作虎皮,引用一千位西方理论家,做一万条注释,还是不对,其文风亦会显得恶俗,具有破坏性。

小而言之,由批评家的文风可以识别一个批评家的好与坏,对或错,因此批评家不可不慎。大而言之,由批评家的文风可以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状况和文学状况。若批评家们总处于宾位,批评文风也不好,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状况一般也不会太好;若批评家们往往处于主位,批评文风较好,那么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状况应该也会很不错。再大而言之,由批评文风甚至可以知道一个时代风气的好坏,批评的文风与时代的风气息息相关,因为批评家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其境界、精神风貌和文风大体上能看出这个时代的风貌与风气。

整风云云, 其实就是循名责实, 由文风而至于思想。整风就个人而言就是整理自己的思想, 如此文风就会一新; 整风就社会而言就是整理社会的风气, 由此社会风气亦会一新。批评家要改变批评文风, 须从根子上入手, 全面提升自己的品位与境界, 境界一变, 其文风亦会随之一变。这样, 不仅于自己有益, 对文学甚至这个时代也都会有益处。

“倡导优良批评文风”笔谈(十六)

■评 论

向命运宣战的奋进者

□何西来

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她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才气,开拓了自己独特的海外华人题材的领域。她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跨国之恋》《打到车臣总统府的官囚》等,都是视角独特、思想深刻的海外华人、华侨题材的作品。

雅文并不是一个幸运儿,她的点滴成功的取得,都伴随着血和泪。雅文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艰难困顿中锐意进取、顽强拼搏、不认输、不言败的女性形象。这种进取精神和奋斗意识正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及其知识分子的极其可贵的品格。这就是《生命的呐喊》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她不止在为自己和跟自己一样的在逆境中、在苦难和挫折中奋进的生命呐喊,而且是为一种强韧不屈、刚毅勃健的民族精神在呐喊!如果我们仅仅把《生命的呐喊》看做个人反抗命运不公的倾诉,那就低估了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

和时代意义,也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生命的呐喊》中的张雅文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当代知识女性的艺术典型,她代表的不是她个人,而是社会底层奋斗出来的广大知识女性。

雅文是一个单纯、开朗、正直而热情奔放的人。无论是她的为人,还是为文,都表现出一种真诚而激情四射的个性,表现出一种社会良知及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流露出一种弥足珍贵的平民意识和悲悯情怀。她不媚上,不卑下,从不为了取悦什么去写作,即便歌颂崇高伟大的人物,在挖掘人物闪光点的同时,也能以深邃而敏锐的目光探寻着事物的本质,挖掘出更深层的思想内涵。在《为了拯救千千万万的生命》这篇报告文学里,她讴歌了著名心外科专家刘晓程用精湛的医术拯救人类的生命,用圣洁的心灵净化社会人群的精神境界。同时,她的笔墨也拓展到更深层的、关系到家家户户切身利益的中国医疗改革,触及到中国医疗腐败等诸多体

制性的弊端。《走过伤心地》写的是傻子屯的党支部书记振中带领全村傻子改变命运的先进事迹。但这部作品并没有止步于好人好事的书写,而是更进一步揭示出导致傻子屯形成的真正原因,揭示出人类的愚昧和社会的冷漠,以及先进人物的自我救赎、社会松绑等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报告文学集中,雅文还选入了三篇有关生态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走过伤心地》《呐喊,不仅为了一个人,一座山》《放下你的猎枪》发表于80年代末。这在当时是很有前沿性的题材。三篇作品分别是写人与水土、人与树木、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以此来呼唤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和不要肆意摧残、践踏其他物种及环境的生态伦理。

张雅文不是一个玩文学的人,她视文学为生命,对文学怀着一种崇高的敬畏之心。她对创作、对人生,怀有火一般的激情,而且抱着强烈的求知欲。她渴望得到交谈者对其作品提出宝贵意见,渴望得到赐教。这种求知心理和谦虚态度,是她个性中非常宝贵的特质。正因有了这种出于至诚而非作秀的特质,她的创作才不断进步。她懂得踏着贤者、智者的步伐前进。而且,她耐得住寂寞,把自己在书斋里一晃就是几年,不为窗外的花红柳绿所诱惑,不为点滴荣誉所蛊惑,这在当今浮躁的社会里是十分难得的。

一种有气质的书写

□师力斌

叶临之是一位有潜力的作家。他的语言感觉很好,细腻,婉转,富于表现力。这可能与与是一位诗人有关。

细腻的语言加上非常讲究的叙事,形成了叶临之特别明显的书生气。叶临之有日本留学的经历,但他相当一部分的故事却多是关于中国的叙述。叶临之的小说有一种奇怪的结合感,将一些互不搭界的元素勾兑在一起。笔下的人物总是对普通人物特殊性的呈现,他有一类题材中的人物,如他的打工者不像打工者,倒是波希米亚式的流浪艺术家(《羽弃生》中的工人歌手陈永冰),他的农民不像是农民,倒像是一位生活落魄的痴情公子(《白婚》里的窑工桐子)。这些人物的骨子里都像极了知识分子,有一种忧郁、失意却高傲的气质。我当然不能将此当成作者的自传,但却分明读得出作者的自况。

叶临之的小说属于艺术小说,也就是所谓的纯文学。叶临之是80年代写作的宁馨儿,他不怎么照顾普通的读者。如果放在音乐里,是高雅音乐,如果在美术里,绝不是商业绘画。他的人物和故事并不复杂,但非常曲折迷离,有时候甚至挑战读者的智商。他的小说像极了先锋派小说,但又比先锋派多了一个现实生活的内核。比如,《白婚》写矿难和传统观念给男女主人公造成的人性伤害,比如《羽弃生》所呈现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特别是发表在《天涯》的《白婚》,几乎就是底层写作。也难怪被《天涯》这本素以关注底层问题的杂志所选。但是,呈现底层的艰辛与揭示社会问题,显然不是叶临之最主要的目标。叶临之的目标在于借这些底层故事来阐述他对人性的细微观察,以及宣泄他对这些观察的叙述趣味。后者有可能更加突出。

我的感觉是,叶临之对于“怎样写”的迷恋远远大于“写什么”。作为“80后”,叶临之与韩寒、郭敬明、吕魁等人明显不同。叶临之倒是与笛安在精神上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揭示人的精神境遇方面。他并不着意要揭示现实背后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对个人以外的阶层、历史等问题似乎也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某一种独特的人生情境,一种个体化的内心感受和精神世界。“个人化”写作在叶临之的小说中又一次呈现出来。叶临之在近年先后发表了十余部小说,这当然是厚积薄发,但也说明叶临之的艺术坚持正在被认可。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认可更多地是对他独特的写作气质的承认。

■新作快评

弋舟《怀雨人》 《人民文学》2011年第3期

弋舟的中篇小说《怀雨人》是一篇先锋性很强的小说。小说写了这样一个人,名叫潘侯,与其大学同学李林,即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之间,是一种“受监护”与“监护人”的关系。之所以形成这种关系,是因为潘侯的大脑有别于“正常人”,具体说,就是他没有正常人的“方向感”,走路会碰树撞墙,生活和就学不能自理。然而他又是一个智力超强、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能在“十秒钟内运算出七十二的四次方”,是个学哲学的。第一次见到学中文的李林时,他会发问“你从哪里来?”如同苏格拉底对于“人”的拷问。当对方回答“西安人啊”,却引发他由大唐建都地“细数唐朝近三百年的历代帝王”,即是说他很了解“人的历史”。他因一部翻译影片而得名叫做“雨人”。

潘侯的相关细节意味而没有意念化,是那样充分地发自然性格深处。譬如潘侯在学校操场上锻炼,那种“摧枯拉朽的狂奔”,让我们能够直观到“他始终在妄图自己决定一些事”,并体验到他身心的那种自由的愿望,觉出他“宛如一个婴儿般的令人疼惜”,再看这块操场,确实“成为了一片苍凉无际的荒原”。

弋舟细腻精致地描写了潘侯由一个没有“方向感”的生活低能儿一步步走向“正常”,所经受的自我约束和压抑、种种“碰撞”的情节和精神变化的过程,其中有他“躲在铺上瑟瑟发抖,喉咙深处发出诡谲的喘息”,也有他在一个“黑壳笔记本”内记录下的他对于社会人际的看法,能作为“一些人在尘世走过这么一遭的佐证”的东西,还有他的一次可谓纯净真挚的恋爱和他形而上的爱情观。尽管那个学物理的“永远深潜物质守恒的女生”朱莉,不

避讳说她爱的就是“潘家这棵大树”,但潘侯对她依旧不改痴情,在那个“白菜豆腐”的小饭馆“虚拟”她的存在,为她摆上碗筷,给她擦桌。因为潘侯认为:她爱我,我才爱她,那不是爱情。爱情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一个人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事。当他的“监护人”李林问他:“朱莉爱你的什么?”他却只回答“我爱她。”“那么你爱她的什么?”潘侯回答:“身体。”李林说:“身体是人人都有共性,你怎么不去爱别人或所有的她们?”潘侯说:“是的,我爱她们。”

上述细节不仅赋予潘侯“泛性爱”的人性哲思,而且形而上地给出他纯净透明的心灵天地。所以其中还有他那样的精神之旅——走向那座“废弃了的天主教堂”,这片神的废墟就是潘侯的领地!潘侯只有在这里才不会碰壁撞墙,行走不会再遇到任何障碍物,他眼前的路径条分缕析,他还牵着李林的手,像是成为李林的“监护人”和向导。因为这里没有人们故意摆放在宿舍中间的椅子、水瓶,乃至“绊马索”之类。他在这里能够纵情朗诵阿赫玛托娃大段的诗歌,还能带他的女友来这里幽会。

弋舟运用这些细节不仅使之人物个性丰满,还让整体情节蕴含浑厚、寓意深邃。就在他不断走向“正常”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他“出色的空间感成功地绕过了这一切陷阱”,但是他“反而丧失了那种明快的披荆斩棘的虎虎生气”。弋舟给了他一个又由“正常”返回的精彩书写!一个晚间,他带着女友朱莉来到那块神的废墟,他的女友被四个强徒糟蹋了,他却依照“正常人”教派的“自为”的规则逃逸了。接下来他离开学校、离开家庭,乃至与这个世界诀别。

朱莉这个人物也不是单向度的,她是在梦想破灭后,说出“我爱他!”从她的病榻下取出那本黑壳笔记本,递给了李林。因为李林在人物设置上就是潘侯的另一面或说就是同一个人,如同歌德笔下的靡菲斯特之于浮士德。那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的几行献词,不仅是灾难后的朱莉所爱的、所认同的,更是李林的精神的同构:“我总是向着坚硬撞去/有一天我撞向了你/从此世界打开了一道柔软的缝隙”。

李林从个人鲜活生动,显得更加有分量。他举起左手于眼角边向潘侯示意:“向左!向左!将自己拽出肉体。”那也是对他自己精神的召唤。末了在搜寻潘侯行踪时,他还是用这个动作,放逐了他的逃避。他不仅伴着潘侯的肉体奔跑,还陪着潘侯苦痛地思考。他会因为自己曾制止潘侯不要这样那样,而感到懊悔和自责,他也能感受到潘侯“那喘息经过努力压抑后,蠕动着,像窖井下涌动的暗流”,小说最为精彩的就是末尾“放逐逃逸”,弋舟把两颗灵魂的无言对视写到了骨髓里,的确让我们看到数十年后“校门口潘侯留下那只足印”,“有时我趁着四下无人,就会将自己的一只脚踏进那个足印”。

李林与潘侯表面的对立、骨血里的契合,构成小说形式的内部结构,我们是从李林身上看到“这个上帝遴选出来的孩子终获全胜,他活在自己的褶皱之外,不受岁月的拨弄”。用叙事者李林的话说:“我那想象中的红色铅笔一路向左、向左地拐出去。我想知道在红色铅笔的箭头抵达终点之前,是否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与潘侯的步履重合在一起。”

生活低能儿的人生哲学

邵振国

我认识张雅文好多年了,但真正了解她的风雨人生,却是读了她的自传《生命的呐喊》之后。这部作品使我这个早已年逾古稀,并且颇经历过几番人世沧桑和盛衰荣辱的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在这部自传里,雅文用率真而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出生在偏僻荒凉只有一户人家山沟里的女孩子的命运以及她此后几十年的奋斗。为了心中那份崇高的理想,她不断向命运宣战,与命运抗争,以生命做抵押去争取更高的生存境界。她用自己的笔,如实地记录了这个不断向上攀登的坎坷历程。

童年,为了读书她哭着喊着宁可被狼吃了也要去上学;15岁时她又疯狂地爱上了体育,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当里偷走户口和行李,一头跑进体工队当上一名专业速滑运动员,成为国家一级运动员;35岁时她又疯狂地爱上文学,一心想当作家,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最终成为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副主席,黑龙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登上了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

她的文学创作领域涉及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及电视剧创作等多个门类,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电视剧《越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几乎家喻户晓,

来自民间的知青文本

□肖复兴

近来,关于知青的书多了起来。我读过全国范围、一个地区、一个农场的知青所写的书,但我还从来没有读过一个生产队(兵团时代叫做连队)的知青写的一本书。

如今,这本名为《我们的青春之歌——一个北大荒连队的知青故事》的书就摆在我的面前。这是一本当年去黑龙江省绥滨县绥滨农场18生产队劳动(组建兵团后称二师9团15连),由各知青队自编的书。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出当年他们的苦乐年华和平凡青春,也可以想象为了这本书,他们今日付出了不亚于当年艰辛的代价,以及他们近乎执著不懈的努力。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执著,并且如此的兴味盎然,一定要把这本书出版出来。或许,是对逝去的青春一种感怀至深的怀念,拼命地想追回似水年华?或许,他们所在的连队当年曾经是如此的不同寻常,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连全上下苦累坚持了10年,要不怎么《人民日报》都刊登了呢!连长还借大家的光,得了回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着实风光了一阵子。于是,他们依然沉浸在过去的旧梦之中,希望用今天的回忆让昔日重现。

无论是写他们杀猪、宰牛、养鸡鸭、烧酒、磨豆腐、压豆皮、种菜、种瓜、建冬储菜窖、回北京探亲、朦胧中恋爱……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还是写连里宣传队小提琴、二胡、洋琴、笛子、月琴……演出的丰富多彩的节日;或是别有情趣的养鸡捉狼、穿着鞋子睡觉那样的奇闻故事;或是对在那个年月里过早逝去的知青伙伴年轻生命的祭奠;或是更为奇特的,因为孩子身体欠佳,知青把孩子带在身边开会听报告,孩子童言无忌,竟然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团首长说:“你们都是坏人!”那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都可以看出,他们和作家或学者出版的关于知青的书的不同。他们在书写知青和知青之间、知青和当地老

乡之间、知青和大自然之间的碰撞与情感中,力图追回青春的记忆,再现当年的历史。他们渴望通过这样的集体记忆,顽强地找回失去的一切,和并不完美的现实做着势单力薄却别有意义的对比和抗衡。

这类作品完全是纯粹民间知青文本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它与作家学者的专著互补,让知青这一段新中国的断代史更为真实丰富,让关于知青的研究不仅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让文字的权利归属于民间,文化的资源挖掘于民间。

来自绥滨的我的这些兵团同伴纯真浪漫的叙述,打动了我。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他们和历史学家是多么的不同,后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他们打捞上来的则是如同水草一样柔软的东西。在评说存在着是非非的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青春蹉跎也好,青春无愧也罢,他们至今还活着和当地农民一样的淳朴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来自民间底层的立场;正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被浪灭的人性。我以为这正是这类民间知青文本的价值与意义。

和作家学者的知青文本不一样,民间知青文本中,更加彰显独一无二知青身份,而隐去了现在变化的形形色色的身份。因此,便没有前者容易出现的名利地位的焦虑,从而表达得更为果敢、单纯、直接和平等。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叙述是游离的、断片式的,无法独立而散漫;他们在相互阅读中而得到自我认同,其同质性、互文性和重复性的东西更多;而对抗性、差异性和审视性的东西少了些,怀旧的色彩更为浓郁了些。当然,这种怀旧的色彩,在作家的文本中同样存在。面对历史,重新回顾青春的岁月,怀旧的情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仅仅怀旧是不够的,它会阻碍我们真正地走进历史。